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

动态

第三辑

• 新诗卷 •

學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三辑·新诗卷·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第3辑/赵敏俐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077-2856-9

I. 中… II. 赵…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6773 号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邮购电话: 010-67674055

经销电话: 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开本印张: 720×980 16开本 22印张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07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800册

定 价: 40.00元

编 委 会

主 编 赵敏俐

执行主编 孙晓娅 张桃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王兆鹏 方 铭 左东岭

刘福春 李昌集 吴伏生 吴思敬

吴相洲 林 莽 赵敏俐 施议对

钟振振 钱志熙 徐 炼 黄卓越

蒋 寅 蔡 毅

目 录

[青年学者沙龙]

困境、语境及其他

——关于诗歌精神的讨论 姜 涛 等 \ 1

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

——“青年诗人创作研讨会”实录 西 渡 等 \ 26

[论文索引与摘要]

2006 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 马富丽 等 \ 38

2006 年新诗研究部分论文摘要 孙晓姪 等 \ 96

2006 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 崔月萍 等 \ 143

[新书推介]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

——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读后 李 怡 \ 167

讨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冷 霜 等 \ 171

[诗集与诗学论著叙录]

2006 年的诗集 刘福春 \ 182

2006 年的诗学论著 刘福春 \ 213

[专题·论坛]

对话 2006：中国当代诗歌

感想和感激 陈东东 \ 218

关于中日 2006 诗歌对话的一点感想 西 川 \ 219

温故知新——在北京与日本诗人对话有感	于 坚 \ 220
我思故我在——与日本诗人前辈交流所感	骆 英 \ 221
因为“深”，于是“新”	
——中日诗人对话的启示	杨 炼 \ 223
不仅面对面，而且心对心	唐晓渡 \ 224
对话中的自我与“那个人”	
——关于中日诗人对话的形而上笔记	欧阳江河 \ 226
请让我听听你的声音	翟永明 \ 228
研讨会综述	赵 四 \ 230

诗歌与底层经验

诗歌伦理与深入当代	霍俊明 \ 238
什么是诗歌伦理	龙扬志 \ 248
近年来“诗歌与底层经验”研究综述	冯 雷 \ 256

[学术会议与活动]

面向新诗未来的回顾与交流

——“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段从学 \ 267
--------------------------	-----------

诗歌的声音与形象——“传媒与中国新诗”

暨“央视新年新诗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永 \ 276
-------------------------	-----------

诗歌驻校 诗情驻校

——路也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龙扬志 \ 285
“2006 年网络诗歌研讨会”召开	张海芹 \ 292
“南永前诗歌创作研讨会”举行	哑 河 \ 293
“驻校诗人李小洛入校仪式暨诗歌朗诵会”召开	乔婷婷 \ 294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2006 年度 工作总结	赵敏利 \ 295

[纪事]

2005 - 2006 年新诗纪事	李润霞 等 \ 304
-------------------------	-------------

编后记	\ 345
-----------	-------

困境、语境及其他

——关于诗歌精神的讨论

◇参加人：姜 涛、张洁宇、张桃洲、段从学、孙晓娅

上篇： 何谓 “诗歌精神”？

孙晓娅：提出这个讨论命题的缘起是有感于80年代后期以来新诗陷入了困境，如何在这种困境当中寻找新诗以及新诗研究的出路，应当格外引起关注。我始终恪守一种观点，那就是诗歌的处境其实可以彰显人的存在和精神的真实处境，如果说诗歌萎靡，那么，最直接的原因是人的创作力的衰弱和精神的居无定所，正如一句诗所写：“四处为家的人是无处有家”，这也等于说“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蒙田也曾说过“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既然诗歌可以让我们在灵魂的深处寻找到生命的真实，我们又可以从诗歌当中拾起什么呢？诗歌提升人类文化品格和情感境界，而我们又能为诗歌提升什么呢？置身当下，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昔日以诗的灿烂和繁荣为自豪的泱泱诗国，今日的诗歌却变成了文化领域的装饰品和传媒炒作的焦点，作为在倾心寻找诗意地栖居的新诗爱好者和研究者，我们有必要为新诗寻找一个栖居所在，因而我们的青年学者沙龙的初次讨论指向了“诗歌精神”。根据我们的安排，下面请张洁宇先发言。

张洁宇：我理解晓娅提出这个议题的背后，是有她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关注甚至批评的。我赞成把这种对当下的关注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它其实是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诗歌精神”这个问题。但我想，在提出问题之后，还是应该从现实关注的角度再回到历史的考察，看看新诗的历史上是否存在着某一种诗歌精神，如果有的话，它又有怎样的发展和变化。如果能梳理这样一条线索，也许我们就能回答，现在诗坛的问题究竟是一种诗歌精神的失落，还是诗歌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一种演变。我记得谢冕老师曾经提过类似诗歌精神“转型”的问题，认为现在诗歌完全变为个人化写作了，对此他是有一

种焦虑和批评的。其实我觉得不必那么焦虑，甚至不必有过多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妨历史地考察一下诗歌精神的内涵及其发展，这个梳理本身说不定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和困惑了。

张桃洲：“诗歌精神”这个词让我回想起了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那场讨论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声势非常大，反响也非常大，很多人都卷入其中。不过，后来不少人觉得那次讨论是一场错位的讨论，因为究竟何为人文精神、究竟要不要人文精神，不同的人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说话。也就是说，人文精神讨论的价值和成果并不是那么一致地合乎人们的期待或想象。如果可以做一个类比，我想我们今天讨论诗歌精神，需要明确的几点是：究竟什么是诗歌精神？如何理解当前社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倘若确实有诗歌精神这一说的话，它有哪些几个层面？

姜涛：在人们通常的表述里，所谓的“诗歌精神”当然有多个层面，如主体的高扬、对现实历史的批判、理想主义或英雄主义等，逐一去界定当然是一种讨论方式。但它首先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或者说不同的时代氛围会塑造出不同的精神渴求，也会培养出不同的接受方式，我们对“诗歌精神”的想象或许不是来自诗歌自身，而是来自外部的文化需要。我们今天讨论的“诗歌精神”，重要的或许不是辨别诗歌精神的定义，而是回到具体的时空、具体的语境，关注诗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凸显了出来，与历史发生了有效关联，为同时代的读者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因此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像刚才洁宇讲的那样，要找到焦点，甚至要找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才有可能进入。

张桃洲：我刚才提到的诗歌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类比关系，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晓娅提出这个话题的起因，大概是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陷入了一种委顿的状态，可能就像很多人指出的，诗歌里庸常的东西增多了，日常的琐屑的语言占据了诗歌的主要位置，诗歌好像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少了介入现实的能力。这就有点类似当初人们呼唤人文精神时所说的：人文精神衰落了！晓娅提出这样一个话题的动因、背景是能够让人理解的。所有这些发生在诗歌里的变化、现象，的确构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诗歌在进入90年代以后应该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处理、书写现实。不过，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进行思考时，可能会引起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人

们常说，80年代是一个抒情的年代，90年代是一个叙事的年代。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忽然发现：他所熟知的那种充满激情、理想主义的诗歌不存在了，诗歌似乎一下子陷入到了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然而，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也就是到了90年代，那种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的诗歌是不是必需的？是不是必然有效的？诗歌写作是否一定要延续80年代那种昂扬的气概？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不难发现，进入90年代之后，整个的社会环境、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大家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以及所有这些带给诗人的经验，都发生了堪称剧烈的变化。在这种情形下，以对80年代诗歌的追怀来批评或要求90年代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对的，但很有可能会遮蔽90年代诗歌的真正症结所在。

的确，在90年代以后，人们所认为的那种诗歌或者说所期待的一种诗歌精神好像是没有了，但实际的情形或许是，在90年代，诗歌写作和诗歌精神转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写作成为对某种个人的更加隐晦的经验的捕捉，或者它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与现实、与整个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变得更加隐蔽、不易被人觉察。我充分感受到诗歌精神这个话题的提出，显示了90年代以至当前诗歌某种变化所带来的焦虑和失落情绪。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提起人文精神讨论，比如当时有一部分人就把人文精神理解为抵制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价值、理想、道德滑坡。可是，人文精神是否需要为某种理想、道义负责，或者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道德滑坡之间是否构成必然的联系，则是需要重新检讨的。对于90年代以来的诗歌同样如此，说90年代诗歌必须对当前诗歌的边缘化、诗歌状况的混乱或困境负责，似乎有点错位。一个年代的诗歌有一个年代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的确，我们要重新呼唤诗歌的精神，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站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语境变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面整个诗歌写作所出现的迁移。

我想起最近应《星星诗刊》之约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诗歌的至高律令》，主要是回应这几年讨论得很热烈的一个话题——“底层经验”与诗歌写作，我的基本观点是要对人们大呼的“底层经验写作”持保留意见。之所以谈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提到诗歌精神这个词，会很容易滑向一种“道德诉求”。所谓“底层经验写作”，是一种典型的凭借某种道德优势来掩盖文学自身问题的做法。其实这几乎是一个

常识：文学或者诗歌，在与时代、现实以及各种具体的问题或命题打交道、发生关联的时候，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词方式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现实的道德的方式。我们在这里谈到诗歌精神的时候，我觉得要避免使这样的话题滑向道德这样一个层面。我刚才提到，80年代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氛围，是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在80年代的语境里诗歌精神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它的确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它本身就在那里，非常显眼，不用刻意提及；而到了90年代，这个我们可以捕捉的东西好像不见了，散掉了，隐蔽起来了。这里我只是说它是隐蔽起来了，至于它究竟是散掉了还是变成了别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语境来看待。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的诗歌精神，不能用80年代的诗歌精神来衡量90年代乃至眼下的诗歌；如果90年代的确需要一种诗歌精神，那么90年代的诗歌精神这一问题其实变成了：在90年代，诗歌写作如何是有效的？

姜 涛：我接着桃洲说两句，他刚才说到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氛围的变化对于诗歌的影响，我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我们通常说到的80年代的理想主义，它的整体感是来自特定情境的，如果没有那种情境、那种结构，80年代独特的诗歌气质也无法发生。到了90年代，破碎与乏力之感不光是诗歌界的现象，整个学术思想文化界也似乎经历了同样的变化，80年代激进的、昂扬的情绪普遍消失了，与思想相关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说是学术化，诗歌写作的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也暗示了变化之中包含了某种历史的有效性。从这一点出发，其实我们可以关注诗歌进入历史的特殊性问题。

现代诗歌有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提供一种特殊的回应历史的精神方式，而且它是不能被其他的知识类型，如哲学、伦理、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覆盖。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强调诗歌要有所承担，这自然是合理的要求，但有的时候，诗歌的承担方式恰恰是什么也不承担的，通过不承担任何现成的教条，来承担一种更高级的责任，这就是臧棣的那个有名的讲法：诗歌除了高贵什么都不承担。听起来，这句话可能有点空洞，但恰恰是“空洞”保证了它的灵活和不凝滞，因为诗歌最终不是提供一种实体性的答案，而是另外一些更抽象的东西，或许可以简单地说是一种想象力、是现实秩序之外的另外一种秩序等等。《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中有雪莱的《为诗一辩》一文，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雪莱说“诗人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

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诗歌只是人类情感盲目的产物，已无足轻重了。针对这种批评，雪莱所要捍卫的恰恰是诗歌某种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为诗一辩”也成为现代诗歌的一种传统。

另外，我刚才提到诗歌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问题，这里需要再补充一下，那就是面对时代生活的诸多层面，我们强调诗歌的精神价值，并不等同于将诗歌放在一种公共的价值尺度中去评判。诗歌所提供的或许不是结论，它与人的关联甚至是十分隐秘的，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那些看似与时代无关的写作，才真正进入了时代核心的黑暗之中，这也许是诗歌的奥秘之一吧。

张桃洲：我仍然觉得，谈论90年代及当前的诗歌，或者说我们在今后要倡导一种诗歌精神，应该更多地着眼于诗歌本身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90年代以后诗歌怎样把诗歌精神体现为一种诗歌内部的钻探。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正在进行这种钻矿一样的诗歌探索，包括60年代出生的一批诗人，还有70年代出生的部分诗人。事实上，的确有这么一批人在诗歌的内部领地，各自在潜心地探寻一些真正是诗歌与这个时代的一种对话的方式，通过诗歌的方式来与现实的各种事件对话，而不是通过一些外部的命题来呈现诗歌对现实的关注。80年代以来，诗歌承担了很多外在于诗歌自身的东西，包括它所获得的巨大声誉和非常隆重的英雄般感觉。我认为诗歌应该是一个时代非常隐秘的力量（也许这种说法还带有精英主义色彩），它的方式不是大众式的。这使我想起20年代白采的《羸疾者》这首长诗，是很有意思的，诗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羸疾者，患有多种身心的疾病，但是他在诗人笔下又是以一种尼采式的英雄形象被塑造或期许的。在这个羸疾者身上肩负了很多悲慨的、超越了某种尘世约束的情怀。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这首诗的确提供了那个年代对英雄、对诗歌的英雄主义的想象。这种英雄主义，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的诗歌精神。可见，诗歌精神这个词的涵义，在不同的年代是变化的。

张洁宇：对。我们介入生活、介入历史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了。90年代以后的很多讨论其实都与此相关。包括一些诗人自己也在谈论这种变化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现，批评家们也在讨论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我比较认同的一种态度是：不以一种固有的价值标准去评价，而是积极地认识这种变化。在我看来，很多诗人是在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新的、

自己的诗歌方式，这种新方式的尝试当然会带来改变，失掉些东西、弱化些东西，但同时一定也会产生些新的东西。

姜涛：的确，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进入历史的方式。比如90年代以后的诗歌，读者和部分批评家总在抱怨相对于80年代的诗歌，这些作品过于个人化，远离了公众生活的兴奋点，也缺乏对现实的关注，而这种印象恰恰是一种误解，因为90年代诗歌的一个主要追求，就是要在历史与想象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更为复杂、更为内在，公共的识别程度不高，不能被一般阅读所揭示罢了。因此，我觉得诗歌精神的有无，或者说诗歌介入历史与否，不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同时也是阅读的问题，即个体对历史的特殊担当，能否获得公共接受的问题。这也是某种文化整体性瓦解之后的表现，不只是在诗歌界、文学界，即使是在学术研究中，不也充满了对话的艰难吗？公共性的丧失在当代文化生态中似乎是结构性的。

张洁宇：包括所谓“知识分子”和“民间”的那些争论吧？

姜涛：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民间”，在一些粗俗的诗歌论争中，其实都被立场化了，成为一种攻讦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不必太认真地对待，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些立场都很抽象，缺乏现实性。比如“民间派”的主张中，有一种激烈的抗辩色彩，这些策略在80年代的确是有现实性的。在那个时代，当我们阅读韩东、于坚等人的作品时，读到的不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琐屑，你还可以感觉到有一种特殊的张力包含在其中，或者说能感觉到他们的写作在和什么东西叫劲。用于坚的话来讲，这个东西叫“庞然大物”，指的是一整套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念、生活理念。因而，后朦胧诗歌虽然“PASS”掉了北岛们的崇高感，但他们的身上仍洋溢着某种英雄主义色彩，只是结合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草莽精神和先锋派的虚无感，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80年代不同的诗歌流派之间，你会感觉到某种相似的气质。洪子诚老师就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四川的莽汉派，到了上海就变成撒娇派，骨子里可能是一回事。问题是到了今天，当年的“庞然大物”其实已经很虚弱了，或者说早就转换了内涵，依旧慷慨激昂地扮演什么反叛的英雄，贩卖所谓生命、身体、欲望等口号，实际上已没有了当年的现实性。因为，这样的诗歌恰恰是最安全的，最吻合于一般社会想象的，或者说这样一种叛逆本身就是被纵容的，被消费时代的无度个人神话所鼓吹的。他们抗辩的对象，实际上已是

一个假想的敌人，而他们的背后无意识，恰恰是一个新的“庞然大物”，与原来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相比，它无疑更隐晦了，但冥冥中操控了一切。

挪用草根、底层这样一些概念，来倡导一种写作方向，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就是桃洲所说的，这样的外在伦理尺度，如果不能内化于诗歌，那也只能激起一时的话题，不能提供真实的认识。

张洁宇：刚才姜涛说的一个问题我很同意，就是许多调子很高、看上去特别富有诗歌精神的作品或主张，其实是非常空洞的。那种很有道德感、很正确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诗歌精神。

姜涛：我们都说诗歌怎样边缘化了，但诗歌文化在中国其实很发达。比如我遇到过一些地方官员，像小书记、小处长之类，喝多了酒的时候都会大谈诗歌，显得很有诗歌精神，在一般的晚会上，也经常见到夸张、高调的诗歌朗诵。这些现象，可能都和我们的政治抒情诗的传统有关，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可能已和真正的诗歌精神无关了。

孙晓娅：以往有关诗歌精神的探讨都集中在诗歌的道德价值、文化功能和社会使命等外在于诗歌的一些问题，而我们是要回到诗歌本体的探掘。

张洁宇：其实从新诗的历史来看，诗歌已经承担得太多了。从一开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和旗帜，到后来政治抒情诗的那种姿态，包括后来朦胧诗的崛起等等。诗歌在每个时代虽然承担的东西不同，但所承担的的确都是诗歌之外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内在于诗歌的精神。

晓娅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90年代以后的诗歌，气象越来越小？所以会让人产生萎顿的感觉？

孙晓娅：我很认同洁宇在此处使用“气象”这样一个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词来批评90年代诗歌。显然，洁宇已经注意到这里存在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是不是因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日常生活化、私人化，就消解了当代诗歌的创作价值？90年代以降是否有自觉坚守诗歌精神进行创作的诗人？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否定和肯定。当诗歌精神内化为诗人个体紧张的思考时，当诗歌精神被平淡的、日常的生活对象所承载时，当诗歌精神以反叛、批评、内省的方式呈现出来时，需要我们思考的恰恰是：如何回到诗歌本体，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歌

精神在不同阶段的内涵、指向、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读者的接受与共鸣反映，从多元的维度给予诗歌精神一个开阔的阐释场域。仍然回到洁宇刚才提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当下依然有一部分诗人始终将诗歌精神悬系于创作的神经上，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因素，却改变着诗歌精神的内涵和分量。例如，同样侧重于理性的思考，西川与前辈诗人的理性精神所含纳的诗歌精神却明显不同。

姜涛：刚才桃洲提到一个问题，现在这种诗歌之中的“伪精神”比较多，我有一个看法，精神问题的真伪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与精神尺度存在的方式有关，诗歌带给人的扩张力、揭示力，其实来自一种紧张感，而当下诗歌写作的问题或许就出在了紧张感的缺失上。有的诗人保持了高调的精神向度，也通过写作来实现某种超越性，但关键是一切似乎都模式化、自动化了。另一些诗人则自觉回避了“主题”的压力，更多看重语言自发的活力，对刹那的、即兴的、无度的语言可能性的挥霍，但单纯对语言快感不加反思的追求，导致的可能是活力的丧失，造成诗歌空间的缩减。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上半身也好，下半身也罢，部分当代诗人似乎缺乏焦灼感，缺乏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的愿望，都在各自的世界里心安理得地写下去，很坦然、也很自得其乐，但一种对自我质询的能力也会逐渐萎缩。这可能构成今天诗歌一个很大的危机，由于丧失了独特的紧张感，诗歌写作就容易滑向一种亚文化状态，就像你玩滑板、搞园艺、喝茶、同性恋一样，只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孙晓娅：就是说诗人缺少来自异己的声音，那些貌似从容的写作，其实无法承载个体灵魂和现实之重。这种精神活力，很容易被诗化出来，关键是价值何在。

张桃洲：我想插一句，刚才姜涛讲的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骆一禾的价值需要重新认定。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他对中国诗歌、特别是当代新诗的一些构想。当然，骆一禾的诗歌写作同80年代那种整体的激情的理想主义氛围有关，但他对于诗歌的某些理解也许恰好契合我们所期待的一种诗歌精神，比如他的诗里强烈的生命感受，他的始终充满活力的诗艺探求，都显示了某种逾越80年代诗歌框架的努力，可以说他的诗歌理想并不简单，但他的抱负没有被80年代的诗歌所认同。

姜涛：骆一禾在谈海子时，曾说海子写的是一种大诗，这种

“大诗”是与整个新诗传统相区别的。在他看来，新诗传统提供的主要是一种小诗，它类似于喝茶、看月亮这样一些感性的行为，而“大诗”的理想是要彻底改变诗歌的功能，使它不只提供一些感性的诗意经验，而是能够在根本上触及人类的灵魂，成为一种能塑造历史经验的文化行为。

张桃洲：比如骆一禾在谈到黄昏的时候，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大黄昏，今天再来看他的那首《黄昏》，里面囊括了许多独特的东西。我觉得骆一禾的那种气象是对诗歌的一种期待，但是他没有把它外在化，他在诗歌里面试图包容而不是把它压碎、用它填充诗歌，而是以诗歌自身包容这些东西——文化的、历史的东西。他的很多思索也在里面，比如他提到的“修远”这个词，“修远”也被90年代的一些诗人引为诗歌精神的内涵，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些。我觉得，他的确是有一种担当，有一种比回到屈原时代的诗人高贵的形象，但也可以说是对诗歌本身那种繁复的、复杂的技艺的追寻。我个人认为骆一禾的诗歌不是单纯的，里面所包含的东西特别多。它们一方面与80年代氛围有关联，但另一方面它不单单和80年代有关系。他的抱负超越了80年代。

姜涛：80年代的诗歌抱负有一点是值得重新关注的，在海子、骆一禾那里，写诗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全新诗歌的创造。他们要改变整个新诗的传统，把诗人提升到“王者”的位置，恢复诗歌整体性的文化功能。但他们没有找到一种很有效的语言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强化修辞的强度，用暴烈的词汇、喧嚣的句式来体现他们的追求。当代生活的经验是被取消掉的。海子的名句“我走到人类的尽头”就体现了这种态度，站在某个制高点上、某个终极之处来看待一切，会获得一种宏观的、俯瞰的视野，但过程往往是复杂缠绕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更多是鲁迅那样“过客”的、在路上的状态，一下子到了尽头，很多东西也可能就看不到了。海子、骆一禾的写作一方面激动人心，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内部空洞化的特征，特别是一些长诗，观念性太强，是用想象力和才华撑起了自己的诗歌世界，但这个世界与当代的生存和思考，却很难沟通。很可惜，他们去世得太早了。

张桃洲：我觉得骆一禾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修远”这个词，内涵是很丰富的，它实际上是越过了现代文学的传统，直接通向屈原那一脉。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古代文化，而是

体现了某种诗歌抱负。像海子他们都有这样的理想，但海子自发的成分更重些，骆一禾的这个抱负更加理性一些，他有一些非常理性的具体的规划和设想。

姜涛：其实要说诗歌精神该怎样获得、诗歌怎样介入现实，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张桃洲：希尼那段话曾经多次被引用。我手边就有他的书，让我来念几句：“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他关于诗歌还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认同，如“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溪，不如说是一道门槛，让你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同时体会到诗行传播的经验。这的确是对诗歌的深入骨髓的理解。

姜涛：不仅仅是诗歌，文学亦是如此。文学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不可能的认识之上的，只有理解了文学的无用，它的力量才能真的产生，这也是竹内好笔下鲁迅的态度。

下篇：中国现代诗歌精神的历史特征

姜涛：说到鲁迅，还可以把话题引申一下。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比较早强调诗歌精神的，鲁迅就是一个，虽然他的《摩罗诗力说》与新诗没有太多关联。鲁迅心目中的诗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代言者，一个先知，特别是在一个民族衰败、萧条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来，这个人就是诗人。无声的民族是无希望的，是要灭亡的。鲁迅这样讲，是为了呼唤民族内在的主体性，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而新诗在一开始，似乎没有这样的精神诉求，胡适的新诗路线，更多偏重于形式、语言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鲁迅的发言虽然指向的是文化命题，但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和问题意识，在新诗史上似乎没有太多回响。

孙晓娅：鲁迅创作于1918年的《梦》其实就暗含了他对于过往历史的复杂思考。一个浅层的理解是对过去的梦或历史的一种失望。

张桃洲：这首诗可能包含了一种历史轮回的观念，和鲁迅一贯的思想有一定关系。比如他对民族诗歌的期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雪莱等恶魔（浪漫主义）诗人，这的确有一种诗歌精神在里面，显示了文化启蒙者对诗歌精神的一种期待。

孙晓娅：鲁迅和胡适更为关注新诗身份的社会性、历史性的有效认同，但他们的诗歌作品呈现出的诗歌精神却不同。

姜 涛：在早期鲁迅那里，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那就是他对诗歌或文学的态度是很开放的，没有像后来文学理论所规训的那样，在文学与历史、诗歌与科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区分和差异。在他看来，科学也可能是一种诗，因为科学也是一种神思的产物，是一种主体性发扬的行为。鲁迅那一代，包括郭沫若，他们不是像我们后来人把诗和科学对立起来，像后来人理解的那样科学是实学、诗歌是虚文。比如郭沫若在论诗时，就将诗比做一个细胞，直觉是细胞核，情绪是细胞质，什么是细胞壁等，他甚至用一个公式来说明诗歌的生成。郭沫若的诗和诗论都有很强的医学色彩，背后有一整套科学的系统作为支撑。后来，诗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可能更模式化一些，诗的领域也越来越小，只集中在情感、想象等领域。大家都知道周作人有一篇文章叫《论小诗》，影响特别大，那篇文章不只是谈了“小诗”这种诗体，其实也包含了周作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诗是什么？也就是那种忽起忽灭的刹那感兴，你要用语言把这一刹那抓住，就是诗了。废名后来的观点，与他的老师也很接近，比如说胡适的《蝴蝶》，别人都觉得不好，废名为什么觉得好呢？就在于它是刹那间油然而生的，吻合了他对诗歌本质的期待。按照这种观念，诗歌只能建立在一个短促的冲动上，如果冲动太多就影响了诗歌的完整性，按照这种理念去写，把诗当成刹那的感兴，语言负载的历史能量也会随之被消减了。到了40年代，诗人对诗的理解可能开放得多，我记得绿原就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鲁迅，鲁迅的杂文更接近于诗。在鲁迅的杂文中我们更看出了一种诗歌的力量，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套话，穆旦可能也有类似的感受，他的《五月》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此外，说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者我觉得不太准确，起码应该是一个表现主义者。真正的浪漫主义是考虑情绪怎么样表达的，在平静的回忆中去处理感情，这正是华兹华斯的观点。郭沫若的写作是迸射的、天马行空的，像惠特曼一样。惠特曼提供的诗人形象，是个精力四射的求爱者，他几乎和所有的事物都发生恋爱关系，和男人、和女人，甚至和土地。所谓的“泛神论”，实际上是让所有的事物都兴奋起来。当代的年轻诗人王敖有一首诗，就很接近惠特曼的诗歌状态，王敖在诗中说，“我要浑身长满性器官，让花草、树木、鸟兽等，我接触过的